

#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主要社会问题及其治理

雷甲平

**内容提要**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在社会改造和进行经济建设活动中,出现诸如婚姻及妇女问题、烟毒问题、土匪问题、二流子问题等的干扰破坏。为彻底荡涤旧社会残余,顺利进行边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造,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领导下,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得力措施,对边区存在的问题进行革新与治理,使边区真正成为“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真喜欢”。

**关键词** 抗日战争时期 陕甘宁边区 社会问题 治理

社会问题是社会关系或社会调控失调,影响社会全体成员或部分成员的正常生活乃至妨碍社会协调发展的一种社会现象,民国时期,社会问题不仅在时空上分布很密,程度严重,而且种类亦多。这主要为土地问题、劳资关系问题、灾民问题、难民问题、物价及通货膨胀问题、婚姻及妇女问题、烟毒问题、盗匪问题、赌博问题、娼妓问题以及无依无靠的老弱病残孤的生活困难问题等。这些社会问题的发生原因,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比较复杂。因而对其治理亦有难易之分。我们探讨陕甘宁边区的发展历史,也应该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本文主要探讨共产党和边区政府对婚姻及妇女问题、烟毒问题、土匪问题、二流子问题等问题的治理及治理成效。

## 一 婚姻及妇女问题

### (一)旧婚俗存在的问题

陕甘宁边区正式建立于1937年,所辖陕北、陇东、宁夏东南部共32县,其中大部分辖区在陕北。边区建立之前这些地方经济落后、交通闭塞,存在着买卖婚姻、童养婚、站年汉、招养婚(已婚妇女因丈夫无力维持家庭生计,另招一夫负责抚养原夫全家的一种婚姻类型)、转房婚(当地也称“转搓”,即贫寒之家,兄死弟妻其嫂,或弟死兄妻其弟媳的一种婚姻类型)等多种传统的婚姻形态,其中买卖婚姻尤其盛行。陕北地区自古婚姻本不论财,方志记载,当地风俗有五美,其一就是“婚礼旧俗不争财”。光绪以降,当地婚俗为之一变,“诗礼素封之家不讲财礼,贫户先议财礼”。<sup>①</sup>横山、米脂、绥德一带,“按县俗,定亲先讲财礼,为数不等”。进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买卖婚姻成为主流,出现身价高达百多元银洋或20石(每石360市斤)米麦的姑娘。<sup>②</sup>包办、买卖婚姻将两性的

① 清光绪朝丁锡奎修、白毓章纂:《靖边县志》卷一《风俗志》清光绪二十五年排印本,第175页。

② 《横山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13页。

结合当成了经济利益的交换,严重摧残了男女青年尤其是女性的身心健康。因为娶亲要很多的彩礼,许多贫苦人家的男子无力支付,有的只好做“站年汉”为女方家庭作工,以数年的劳作换得一个老婆,有的甚至终身不能娶妻。<sup>①</sup>传统的家庭关系也不平等,当地有民谚“打倒的婆姨揉倒的面”,“女人不是人,母猪不敬神”,父权家长制家庭里男性、丈夫的地位高于女性、妻子,丈夫打骂妻子、公婆虐待媳妇是很平常的事。这一时期流传的许多陕北民歌就是对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家庭制度和妇女地位低下的控诉。<sup>②</sup>

## (二)边区政府对旧婚俗的改造与影响

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权建立,即开始着手对不合理的婚姻家庭制度进行改造。1939年4月,边区政府先后颁布了《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和《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以下简称《婚姻条例》)、《陕甘宁边区禁止妇女缠足条例》(1939年)、《陕甘宁边区抗属离婚处理办法》(1942年)、《陕甘宁边区婚姻暂行条例》(1943年)、《修正陕甘宁边区婚姻暂行条例》(1944年)等。《施政纲领》中明确指出:“实行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的地位,实行婚姻制度,禁止买卖婚姻与童养婚。”《婚姻条例》的基本精神与《施政纲领》完全一致,其主要内容有:1.男女婚姻照本人之自由意志为原则。2.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纳妾,禁止包办强迫及买卖婚姻,禁止童养媳及童养婚。3.婚姻年龄,男子以满20岁、女子以满18岁为原则。4.男女双方愿意离婚者,得向当地政府请求离婚登记,发给离婚证。5.男女一方有重婚行为、感情意志根本不和,虐待他方、与人通奸等,他方得向政府请求离婚。6.离婚时的子女及财产关系规定。<sup>③</sup>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边区政府颁布的《婚姻条例》体现了近代以来以尊崇自由平等,保障个人权利为立法原则的进步趋势,同时也遵循了1934年江西苏区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主要体现为4点:1.确立了以个人自愿为婚姻成立的基本原则;2.实行一夫一妻制,男女平等;3.实行离婚自由;4.考虑到女子的实际情况(经济尚未完全独立、缠足等),在有关规定上偏于保护妇女。

在颁布新婚姻法和其他条例的同时,1939年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提高妇女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案》提出“废除一切歧视妇女的制度”,以及鼓励妇女参政、培养妇女专门人才等办法。《婚姻条例》的颁布以及一系列旨在提高妇女社会地位的措施的实施,强烈地冲击了边区原有的婚姻家庭模式,引起社会生活一系列的变化,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

其一,男女青年反对父母包办、买卖婚姻成为潮流。政府不仅鼓励恋爱自由、婚姻自由,还给与法律上的保证,这对于那些长期被当做父母的财产买来卖去的乡村青年男女来说,不啻是一次精神上的启蒙和解放。新民歌里唱道:“从前的礼法太古董,男婚女嫁都由老人,实实我难受得很。现在的婚姻由自己,自由婚姻没毛病,真是我畅快的很。”<sup>④</sup>有很多青年开始反对父母包办的婚姻。其中最著名的是封棒儿婚姻案。华池县女子封棒儿的父亲贪图钱财,将女儿先后卖给两家,引起纠纷。封棒儿告到政府,边区法官马锡五处理此案,将买卖双方绳之以法,封棒儿与自己的意中人结婚。这件事轰动整个边区。<sup>⑤</sup>许多青年男女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选择婚事。对绥德县县立女子小学四、五、六年级48个女学生中的45人进行测验,主张婚姻完全自主的9人,主张半自由半包办的24人,主张还是由父母包办的只有12人。<sup>⑥</sup>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地青年已经理直气壮地将感

① 秦燕、岳珑:《走出封闭——陕北妇女的婚姻与生育(1900—1949)》,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页。

② 参见《陕北民歌选》,光华书店1948年版,第68页;党音之编:《信天游五百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页。

③ 陕西省妇联编:《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文献资料选编》(内部资料),1982年版,第54—56页。

④ 陕西省妇联编:《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专题选编》(内部资料),1984年版,第112页。

⑤ 陕甘宁妇联编:《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人事记述》(内部资料),1987年版,第135页。

⑥ 《四十个女学生的测验》,《解放日报》1942年2月16日。

情当做建立婚姻的基础。延安有一位女子不愿意父亲为其安排的婚事,坚持要嫁给自己喜欢的一位部队的排长,对父亲的毒打她宁死不从。当部队首长亲自处理这件事时,有下面一段对话。问:“你爱不爱张排长?”“爱。”“他是干革命的,没有钱,你也爱么?这可是终身大事。”“我就是爱他,我死也要跟他!”部队首长非常惊奇,连声赞叹,“真坚决,真伟大!”<sup>①</sup>

其二,出现自由结婚、举行新式婚礼的新风尚。边区各县逐渐出现自由结婚的新风尚。如绥德县延家川 30 多个男女老少讨论婚姻问题,商定由农会帮助自由结婚的人,如男女双方同意,父母阻挠,农会有权干涉劝解。有男子看上李家沟一女子,女方也愿意,但女方父亲要钱,农会出面讲理,终于将女子娶回。农会组织人送礼、闹房十分热闹。在这一做法带动下,延家川一月之内就有十几对青年自由结婚。<sup>②</sup>清涧县苏家塔村一女子与部队通讯员自由恋爱、自由结婚,许多村民都表示赞成,说“世事到这里了,取消了买卖婚,才能自由结婚”。<sup>③</sup>自由结婚还进一步扭转了当地旧式婚礼讲究铺张的风气。如米脂县由边区常驻议员、政府委员开会议定《婚丧节约办法》“男女双方不得强索门箱、首饰、嫁妆,婚礼费用概从简约。”与会者首先实行,然后按群众认识程度逐渐推广。<sup>④</sup>定边县郭家坛嵯村二对夫妇实行新式婚礼,新人佩带大红花,由冬学的教员担任司仪,还扭秧歌。群众说,这婚礼又红火又省钱。<sup>⑤</sup>

其三,贯彻男女平等原则,提高了妇女的家庭、社会地位。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陕甘宁地区的小农家庭,长期形成了男尊女卑父权家长制的家庭格局,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介入,很难想像它在 20 世纪中期会发生什么变化。边区政府成立以后,根据地的广大妇女成为抗战中的重要人力资源,政府认识到“目前抗战,需要广大农村妇女有组织的帮助,比任何时候更为迫切”,“动员妇女参战是奠定保护妇女切身利益的基础,保护妇女切身利益又是深入广泛动员妇女参战的必要条件”。<sup>⑥</sup>故此,边区政府积极从各方面改善妇女的生活和提高妇女的地位。婚姻法颁布以后,边区妇女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婚姻自由”、“男女平等”成为妇女们改变自己在家庭中地位的有力武器。参议会上,妇女议员提出“反对男人打骂婆姨,要真正实行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妇联会支持媳妇们以反抗的姿态对付公婆和丈夫,为遭受公婆、丈夫虐待的媳妇撑腰,有的地方给虐待媳妇的丈夫、公婆开斗争会、游街等。有时在解决家庭纠纷时,偏于保护妻子重于丈夫,保护媳妇重于公婆。一些妇女们把反对公婆、丈夫打骂虐待作为提出离婚的理由。1944 年绥德分区各县共 65 件离婚案中,有 11 件是女方因受虐待而提出离婚。<sup>⑦</sup>

边区开展的抗日支前、大生产运动等活动,带动妇女走出封闭的家庭参加边区建设,出现了一大批当地女干部。与以往农妇不同,“她们已经没有羞怯的姿态,现在她们每人穿一身军服,雄纠纠,都是新时代的女性”。<sup>⑧</sup>1939 年至 1946 年,边区举行 4 次参议大会,妇女积极参加各级选举。1941 年,清涧县参加选举的妇女占妇女总数的 90%。绥德县选出的 460 名乡议员,其中 80 名是妇女。<sup>⑨</sup>所有这些变化都使妇女们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扬眉吐气的感觉。她们说:“过去买卖婚姻,

① 周民英:《婚事》,《解放日报》1940 年 10 月 31 日

② 《陕甘宁边区的婚姻问题》陕西省档案馆,全宗号 46 案卷号 14

③ 《清涧县店子沟区三乡苏家塔村调查资料》,陕西省档案馆,全宗号 46 案卷号 11。

④ 《米脂县婚丧节约具体办法》《解放日报》1945 年 7 月 7 日。

⑤ 《三家群众采用新式婚礼》《解放日报》1945 年 2 月 19 日。

⑥ 张琴秋:《动员妇女参战与保护妇女切身利益的关系》,《解放日报》1941 年 10 月 12 日。

⑦ 《边区的婚姻问题》陕西省档案馆,全宗号 4 案卷号 63

⑧ 《陕甘宁边区突飞猛进的女子教育》,《中国妇女》第 1 卷第 1 期,1939 年 12 月。

⑨ 《动员边区妇女来参加选举运动》,《解放日报》1941 年 6 月 21 日。

现在婚姻自由,这是我们妇女出了头的世界。”<sup>①</sup>“毛主席来了,男人不敢打女人了,女人自由了。”<sup>②</sup>

其四,离婚自由带来离婚高潮。《婚姻条例》颁布以后,边区离婚案件明显增多,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离婚高潮。边区高等法院 1938—1943 年直接判决的离婚案统计如下:1938 至 1943 年 6 年间,经各县判决的离婚案件共 807 件,占各种民事案件第一位。离婚案件大幅度上升明显是在婚姻法颁布之后,1943 年离婚案较 1938 年增加 225%。<sup>③</sup>

边区政府颁布的婚姻法做为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规则,其最直接的受益者是当地妇女,她们知道了争取自己婚姻幸福是正当的,是能够得到政府支持的。旧式婚姻里被随意买卖、家庭里低下的地位、以及长期的压迫和束缚,使妇女们的痛苦和不满以离婚自由为突破口,猛烈地爆发出来了。在逐年增多的离婚案里,由妇女一方提出离婚的占了绝大多数。子长县给民政厅的报告称,离婚案件逐年增多,十分之九尽是女方提出离婚。<sup>④</sup>1940 年绥德分区共处理群众离婚案件 99 件,其中 94 件是由女方提出的。要求离婚的妇女大都采取了较为坚决的态度。吴堡县政府所在的一家饭铺,经常住着十几个要求离婚的妇女,政府不批准离婚坚决不回去,有的长住达三四个月。<sup>⑤</sup>有的妇女采取了激烈的不妥协的态度,坚持离婚不惜寻死以达到目的。1943 年一年,延安县就有 9 个妇女因婚姻问题自杀。甚至发生了因离婚不成而谋杀丈夫的事情。<sup>⑥</sup>

### (三)边区政府提高妇女地位的举措与成就

在改造旧的婚俗的同时,边区政府想尽一切办法,提高妇女的文化素质、政治地位,鼓励妇女参加社会劳动。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1 大力发展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不断提高妇女的思想文化素质,帮助她们逐步摆脱愚昧无知的状况。1937 年 9 月,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作出《关于边区妇女群众组织的新决定》,要求各级党和政府“领导妇女积极参加识字运动和国防教育,组织妇女识字班,唱歌班,动员青年妇女及儿童进学校。在友区中并须提出男女同校,添设女子学校等,以提高妇女的文化水平与救亡知识”。<sup>⑦</sup>边区政府成立以来,党领导各级妇联等组织积极开展冬学、夜学、识字班、夫妻互教等形式多样的扫盲教育活动,帮助妇女提高文化水平。据统计,“1938 年入学的妇女只有 9263 人,1939 年便增加到 11818 人,特别重要的是小学女生的增多达四倍以上,这充分说明了边区妇女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sup>⑧</sup>特别是妇女干部的文化层次有了较大提高,边区区级女干部有半数以上能识几百个字。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边区妇女还学习有关妇女解放和抗日救国的道理以及一些简单的医学知识和看护常识等,广大妇女不仅文化素质有了较大提高,而且民族意识和社会意识也得到了增强。

### 2 引导妇女参政议政,帮助妇女实现政治上的当家自主

中共自成立以来就一直高度重视妇女在政治地位上的解放。早在土地革命斗争时期就有过引导妇女参政议政的实践。中共到达陕北之后,继续鼓励妇女参政议政,帮助她们实现政治上的当家自主。《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明确规定:“凡居住在边区境内的人民,年满 18 岁,不分阶级、党派、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和文化程度的差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sup>⑨</sup>1939 年边

①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 3 辑,档案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93 页。

② 秦燕、岳珑:《走出封闭——陕北妇女的婚姻与生育(1900—1949)》,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09 页。

③ 《陕甘宁边区的婚姻问题》,陕西省档案馆,全宗号 46,案卷号 14。

④ 《不完整的统计》,陕西省档案馆,全宗号 4,案卷号 65。

⑤ 《十件离婚案》,《解放日报》1945 年 7 月 27 日。

⑥ 《十件离婚案》,《解放日报》1945 年 7 月 27 日。

⑦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37—1939)》(内部资料),1993 年编,第 46—47 页。

⑧ 《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 1 辑),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93 页。

⑨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 1 辑),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93 页。

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的《提高妇女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案》中还强调：“鼓励妇女参政，各级参议会应有 25% 的女参议员，各机关应大量吸收妇女工作。”<sup>①</sup>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妇女们普遍享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政治上取得了和男子同样的权利。而 25% 的女参议员最低比例的规定，既表明了中共对妇女政治解放的高度重视，又是中共维护妇女政治权利的一项重要举措。

1941年 1月，边区进行第二届各级参议会选举，《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动员边区妇女参加选举运动》的社论，指出：“为了提高妇女的政治认识和觉悟程度起见，为了使边区妇女很好地使用已获得的民主权利起见，当此边区选举运动烽火正烈的时候，我们应该向广大妇女群众进行不断的广泛的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使她们认清选举的政治意义和妇女的关系，更进一步的造成妇女参加选举运动的热潮。”<sup>②</sup>党和边区政府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使边区妇女政治意识不断提高，认真自觉地履行自己的政治权利。在广大妇女的积极参与和推动下，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举行第一次民主选举，选出高敏珍等 19位女参议员，并通过了关于“提高妇女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提案。到第二届边区参议会选举时，全边区 30% 的女性参加了选举，有些县、区达到 90%。选出乡级女参议员 2005人，县级女参议员 167人，边区级女参议员 7人，一些妇女被选为乡长、区长。在各县乡的参议员中，妇女都占有相当比例，如绥德县女参议员占 22%，赤水县女参议员占 14%，子长县妇女当选者占 20%。<sup>③</sup> 妇女不仅能够积极参加选举活动，而且在选民大会上敢于“议政”，大胆地对政府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如庆阳市第六乡的选民大会妇女占半数多，妇女提了许多意见，包括反对买卖婚姻、反对童养媳、反对男人打骂女人、反对公婆苛待媳妇、反对男人吸烟赌博。<sup>④</sup> 当选的女参议员也逐步学会运用议案向政府提出建议，为自己争取权益，初步尝试了民主参与、影响决策、参政议政的实践活动。在中共的领导下，边区妇女的政治素质和政治意识有了较大的提高。伴随着政治意识的觉醒，边区妇女的民族意识也不断增强，她们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支援抗战，“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就是最生动的写照。

### 3 号召妇女积极参加生产实践，实现妇女经济地位上的独立

1940年 2月 8日，毛泽东给中央妇委发出指示信特别强调：“妇女的伟大作用第一在经济方面，没有她们，生产就不能进行，而边区的妇女工作之少成绩，我看主要在没有注意经济方面，提高妇女在经济、生产上的作用，这就能取得男子同情的，这是与男子利益不冲突的，从这里出发，引导到政治上，文化上的活动，男子们也就可以逐渐同意了。”<sup>⑤</sup>因此抗战中后期，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解放运动逐渐转移到以促进妇女经济独立为中心，积极开展妇女生产运动。1940年 12月陕甘宁边区妇联会号召广大妇女积极投入家庭手工业、家庭副业和畜牧业生产，推动边区的经济建设。根据边区妇联扩大执委会会议的决定，边区妇联制定了 1941年工作计划，其中心工作是动员妇女参加经济建设，其中包括发动妇女参加农副业生产，提高妇女纺织技术，推广陇东、绥德妇女生产和合作社经验，边区妇联成立生产研究委员会专门讨论生产等。自此，陕甘宁边区妇女生产运动在抗战初期的基础上更广泛地开展起来。1943年 2月中共中央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的方针决定》（即著名的“四三”决定），号召包括陕甘宁边区在内的各解放区都应该普遍开展妇女生产运动。

① 《中国妇女运动史资料 1937—1945》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76 页。

② 《解放日报》1941年 6月 21日。

③ 陕甘宁边三省区妇联：《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大事记述》，第 101 页，《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专题选编》（内部资料），1984 年 12 月，第 28 页。

④ 逸平：《胜利的收获》《解放日报》1942 年 10 月 20 日。

⑤ 全国妇联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论妇女解放》，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6 页。

在全国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开展妇女生产运动形势下,陕甘宁边区的妇女生产运动走向了高潮,妇女群众动员之广前所未有,整个边区妇女都投入到大生产的热潮中,成为边区生产建设的重要生力军。上至八十几岁的老太,下至七八岁的小女孩,无论是农村还是机关学校的妇女,都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并涌现出一大批女劳动英雄和模范,如郭凤英、刘老婆、李凤莲、黑玉祥、张芝兰、冯桂英等共有300多位。尤其在纺织方面,妇女们的成绩最为突出。仅1944年,陕甘宁边区纺织妇女就达152645人,占边区有劳动能力妇女的60%;织布114507大匹,占全边区军民用布的1/3。从1938年到1945年,近20万妇女共纺纱约600万斤,织布约46万大匹;1940年后,妇女织的布就能解决全边区军民需用布匹总数的1/3。<sup>①</sup>妇女参加社会生产活动既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树立了她们自食其力的信心,也为繁荣边区经济和支援前线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

## 二 烟毒问题及其治理

### (一) 烟毒存在的状况及其危害

烟毒也是边区政府建立后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陕甘宁边区内部烟毒比较严重,直接影响着边区的经济建设、人民的身心健康和社会治安。探究产生烟毒的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

一是历史遗留。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政府开始征收“洋药”税,同时一体征收“土药”税(“洋药”是指境外进口的鸦片,“土药”是指国内生产的鸦片)。这实际是默许鸦片进口和国人种植罂粟、制造鸦片。清政府的这些规定,使一些本来不种罂粟的农户,也开始栽种。据资料表明,陕北地区和全国各地一样,漫山遍野,到处都在种植罂粟。清末陕西也开始征收鸦片税,罂粟的种植取得了合法地位,全省普遍种植,并逐年有所增长。1906年陕西种植罂粟已达35460公顷。<sup>②</sup>特别在20世纪20—30年代,鸦片的种植面积远远超过了粮食的种植面积,“因军阀的劝种鸦片,以致大好良田都栽满了杀人的毒物”。<sup>③</sup>陕西“各县种烟亩数,最高者占地百分之九十,最低者百分之二十”。<sup>④</sup>据有关资料记载,陕甘两省的罂粟种植面积分别占农田面积的90%和75%。<sup>⑤</sup>虽然清末民初,政府都曾禁止过鸦片,取得过一些成效,但最终均告失败。

一是日本毒化政策的影响。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在中国肆行毒化政策,并以此作为摧毁中国军民抗战意志的重要武器。所谓毒化政策,就是日本侵略者在其占领区利用日伪政权,强迫农民种植鸦片,实施鸦片专卖,设立烟馆,征收鸦片捐税,设置制毒品工厂、加工毒品,向沦陷区、抗日根据地及大后方贩运出售毒品,以攫取中国财富、打击与削弱中国国力、摧残中国人体质、瓦解中国人民抗战精神的政策为目的。对此,国民政府内政部禁烟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德溥指出:“日本曾不择手段地推行其侵华政策,使用毒品以残害中国人民是其既定政策之一,企图以毁损人民的健康,使中华民族的精神彻底崩溃。”<sup>⑥</sup>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毒化重点在东北、华北、华中和华南,但陕甘宁边区也未能幸免。“敌区烟毒每多偷向我后方运售,遂使我边区干净土地亦遭波及。”<sup>⑦</sup>

种植鸦片者多,吸食者也多;吸食者多,又促使种植者增多。吸食、贩卖、种植相互促成,造成恶性

① 转引自张秀丽:《简评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的历史地位》,《延安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第26页。

② 陈国庆:《走出中世纪的黄土地—二十世纪初期的陕北农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页。

③ 石筍:《陕西灾后的土地问题和农村新恐慌的开展》,《新创造半月刊》第2卷第12期,1932年7月。

④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9页。

⑤ 齐霁:《陕甘宁边区禁烟禁毒运动初探》,《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⑥ 王德溥:《日本在中国占领区内使用麻醉毒品戕害中国人民的罪行》,《民国档案》1994年第1期。

⑦ 陕西省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查禁烟毒史料选》,《历史档案》1993年第1、2期。

循环。根据书载：陕北地区各县，尤其是宜川、甘泉、神木等均设有烟市，每至夜晚灯火万点，皆为吸食鸦片者所燃；城里人吸烟的几乎占到一半，乡里吸烟的人也约有 1/4 左右；宜川县城一到夜晚，往往是老少奔波，男女多喜吸鸦片，始而城镇，继及农村；始而富豪，继而穷苦。<sup>①</sup> 1936 年，延安城有居民 1096 户、4841 人，就有官办烟馆 5 个。<sup>②</sup> 种植罂粟和吸食鸦片遍及各地，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首先，烟民们贪图鸦片之利，大面积种植鸦片，严重影响了粮食作物的生产。其次，边区内民间向来生活艰苦，百姓们一年所得无以温饱，许多人用养家糊口的活命钱去购买鸦片，穷困潦倒之时，或者沦为盗贼，打家劫舍，盗取和强抢钱物；或者倾家荡产，因此而变成二流子，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再次是边区极少数贪图重利之徒，不顾政府的禁令，偷运、贩卖和私种鸦片，使陕甘宁边区吸毒现象又死灰复燃，各种毒品犯罪活动比较严重。根据 1942 年陕甘宁边区统计，全边区烟民每月总共消耗在百万元（边币）以上，少数部队官兵和机关工作人员也染上了毒瘾，甚至参与贩毒。在陕甘宁边区处理的刑事案件中，以毒品案为多。据陕甘宁边区 1939 年至 1941 年 6 月 20 个县的统计，由司法机关审理的烟毒案件就有 1157 件，占全部刑事案件的 25.41%。<sup>③</sup>

(二) 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禁烟毒措施

为了肃清根据地的毒品犯罪，粉碎日军的毒化阴谋，保卫边区人民的身心健康，维护边区政府的声誉，争取抗战的胜利，陕甘宁边区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专门的禁毒机构，制定和颁布一系列查禁烟毒的法规法令，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边区境内开展声势浩大的禁毒运动，基本遏制了毒品在边区境内的蔓延。

1 成立专门查禁烟毒的机构

为了查禁及处理边区境内的鸦片毒品犯罪活动，依据陕甘宁边区政府第 4 次政务会议决议，于 1942 年 1 月设立陕甘宁边区禁烟督察处，由财政厅副厅长霍维德兼任处长，并通过《陕甘宁边区禁烟督察处组织规程》及《陕甘宁边区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后来又在边区重要城市设立禁烟督察分处。陕甘宁边区禁烟督察处为查禁和打击边区境内的毒品犯罪活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2 制定和颁布一系列禁毒的法规法令

为了彻底禁绝烟毒，陕甘宁边区政府从 1941 年 10 月到 1945 年 5 月，先后制定和颁布了大批的法律、法令、条例、章程、办法等。详情如表。

表 陕甘宁边区主要禁毒法规表

法规、法令名称	制定、公布或施行时间
陕甘宁边区禁烟毒条例(草案)	时间不详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禁烟的布告	1941 年 10 月 23 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禁烟处命令	1942 年 1 月 14 日
陕甘宁边区禁烟督察处组织规程	1942 年 1 月
陕甘宁边区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	1942 年 1 月
陕甘宁边区查获鸦片毒品办法	1942 年 9 月 16 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查禁鸦片烟苗的命令	1943 年 1 月 17 日

① 陈国庆：《走出中世纪的黄土地》，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90 页。  
② 延安市志编纂委员会：《延安市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8 页。  
③ 张希坡、韩延龙主编：《中国革命法制史》（1921—1949）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37 页。

法规、法令名称	制定、公布或施行时间
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再申禁种鸦片烟苗的命令	1943年3月12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彻底铲除鸦片的快邮代电	1943年4月13日
陕甘宁边区禁烟督察修正组织规程	1943年5月30日
陕甘宁边区查获鸦片毒品第三次修正办法	1943年5月30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为禁止吸毒事给专员公署(市)政府的指示信	1943年9月11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禁烟督察处查获鸦片毒品奖金办法	1943年秋
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加强缉私工作的命令	1943年11月24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严禁面料入境的命令	1945年5月11日

资料说明:

- 1 陕西省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查禁烟毒史料选》(上)、(下),《历史档案》1993年第1期和第2期;
- 2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一至九辑,档案出版社1986—1990年续出版;
- 3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一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4 韩延龙、常兆儒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 5 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编写、马模贞主编:《中国禁毒史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 6 苏智良、赵长青主编:《禁毒全书》,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版。

陕甘宁边区制定和颁布的上述各项禁毒法规法令,涉及禁种、禁贩、禁售、禁吸等禁毒工作的主要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9个方面:严禁种植罂粟;严禁买卖或贩运烟毒;禁止吸食或注射烟毒;严禁帮助或庇护他人吸食注射及买卖贩运烟毒,严禁抗拒禁烟禁毒职务的执行,违者视情节轻重处1年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金;严禁设立传布烟毒的商店机关,违者视情节轻重处1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死刑,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奖励查获烟毒者和举报人;严禁在禁烟禁毒中徇私舞弊、栽赃陷害;政府公务员、军人从事毒品犯罪活动要从重处罚;严禁与日寇勾结,以烟毒危害民族抗战。这些法规法令有力地保证了禁毒工作的顺利进行。

### 3 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宣传动员活动

首先,利用基层政权组织和各种准军事化团体,如工会、贫农团、赤卫军、少先队、儿童团、妇女协会等,进行广泛宣传,发动民众,让广大烟民了解鸦片的危害、禁毒的意义以及边区政府的禁毒政策法规,使禁毒政策转变为民众的自觉意愿,“许多瘾民纷纷到各地政府申请登记,主动要求戒绝烟瘾”。<sup>①</sup>其次,发动群众,开展劝诫运动。要造成群众运动,不只是对烟民说明吸食大烟怎样不好,而且要在村民大会或市民大会上,作劝诫运动。宣传说吸食大烟的人是不美满的,往往导致毁身败家,使得烟民不能不惭愧。同时发动儿童妇女帮助戒烟,儿童能劝服其家大人戒烟的是模范儿童,妻子能劝服丈夫戒烟的是模范妻子。如果丈夫顽固,乡村政府可允许在其丈夫未戒绝大烟时期,妻子有管理其家经济的全权。第三,发动烟民和烟民的戒烟竞赛,看谁先戒断烟瘾。戒绝了的由政府及群众团体奖励,并让他在还未戒绝烟瘾的烟民中现身说法,广为宣传。第四,戒烟和生产、教育工作联系起来。烟民多是不生产及行为堕落的人(大部分是二流子),要用说服与强迫方法,使其卷入生产大潮,给以各方面的鼓励与帮助。同时要使他们知道自己是社会一分子,至少不应被社会看不起,以激发他们戒烟的决心。1943年边区改造二流子参加生产运动中,不少吸食大烟的二流子戒绝了。可见用积极方法策动戒烟,是很有效的。

<sup>①</sup> 蒋秋明、朱庆葆著:《中国禁毒历程》,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44页。



### (三) 陕甘宁边区禁毒的成就与历史经验

陕甘宁边区雷厉风行的禁毒斗争,有效地遏制了边区境内的各种毒品犯罪活动,特别是基本上消除了原来风行的吸毒现象。“不到半年,烟民的人口比例即已降低 20%”,不到两年,烟民就“从降低 20% 而到达将近绝迹了”。<sup>①</sup> 1942 年禁烟节《新华日报》发表短评,称赞“陕甘宁边区与华北敌后根据地,对禁烟,雷厉风行,至今为止,禁种已完全做到,虽在敌人恶势力毒化政策包围下,禁吸禁售,成绩昭著,事实俱在,不愧称为禁烟模范区”。<sup>②</sup> 陕甘宁边区卓有成效的禁毒工作留下了可供后人借鉴的宝贵经验。

#### 1 政治廉洁、组织高效,是有效开展禁毒斗争的政治基础和组织保证

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实行“三三制”,推行抗日民主,厉行廉洁政治,这是有效开展禁毒斗争的政治基础。陕甘宁边区政府十分重视对禁毒工作的领导,如上所述,设立了精干、高效的禁烟督察处作为查禁烟毒的领导机构,专司边区的禁毒工作,使边区政府的禁烟禁毒政策法令得以顺利贯彻执行,从而有效地打击了边区境内的毒品犯罪活动。

#### 2 禁毒必须有法可依,要加强禁毒立法,完善禁毒法制,是有效开展禁毒斗争的法律保证

如前所述,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十分重视禁毒法制建设,先后制定和颁布了 10 多个关于禁毒的专门性法规法令,涉及禁种、禁贩、禁售、禁吸等禁查工作的主要方面,为边区的禁毒斗争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例如《陕甘宁边区禁烟毒条例(草案)》详细规定了毒品犯罪的种类与处罚措施;《陕甘宁边区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则规定了禁毒工作的执行程序 and 奖励办法,后来对该暂行办法进行了两次修改,使之更加完善;在《陕甘宁边区查获鸦片毒品第三次修正办法》中详细规定了奖金的分配;又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禁烟督察处查获鸦片毒品奖金办法》中具体规定了奖金标准,这对于鼓励单位和个人积极检举揭发毒品犯罪活动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 3 禁毒要走群众路线,广泛教育、发动、依靠人民群众参加,开展禁毒的人民战争,是有效开展禁毒斗争的重要前提和群众基础

毒品犯罪是个社会问题,禁烟肃毒不能专门依赖政府的权威及其所发布的命令,而是要依赖动员广大群众,自觉地认识烟毒的严重危害及禁绝烟毒的重大意义,有组织地执行禁绝烟毒的命令。在陕甘宁边区,当开始进行禁绝烟毒的动员工作时,就举行化装宣传、群众大会,有计划地经过人民已有的组织,如工会、贫农团、赤卫军、少先队、儿童团、妇女协会去做工作,因为她们最厌恶自己的丈夫或儿子吸食鸦片。军人家属的模范作用,也起了不少的影响。进行了认识鸦片之毒害的深刻教育,以后群众都“自觉的感触到非禁绝烟毒不可”,因此“政府禁绝烟毒的命令,转变成为千万人民自己的意志”,大家起来“自动报名,承认自愿戒绝鸦片”。亲属都在互相的规劝着,妻劝其夫,兄勉其弟,父诫其子。大家起来互相作禁烟竞赛,“不吸鸦片的,相约以谁先劝服家人如期戒绝者为胜,犯烟瘾的,也互相比着,看谁先戒断”。<sup>③</sup> 非烟民群众还踊跃捐米送柴,从生活上帮助有困难的瘾民戒烟。瘾民们体验到人间的温暖,增强了戒烟的决心,使戒烟工作得以顺利进行。随着人民群众觉悟的不断提高,也积极而机警地严查私贩烟上的毒犯。有一次,有一个贩毒者,由宁夏河西产烟区,乔装打扮成磨剪刀的手艺匠人,将他的那条安放磨刀石的板凳中间凿空,把煮制好了的鸦片烟膏满满地倾注入内,凝结成块。贩毒伪装如此巧妙,后来还是被一位热心参加禁烟运动的妇女

① 马模贞主编:《中国禁毒史料》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606 页。

② 《禁烟节感言》,《新华日报》1942 年 6 月 3 日。

③ 《群众》,第 2 卷第 1 期社论,1938 年 6 月 11 日。

发现了。<sup>①</sup> 毒贩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由此可见,充分依靠和利用群众自己的力量,来推行禁政,是陕甘宁边区禁烟禁毒成功的根本法宝。

#### 4 实行全面禁毒,重点打击制毒、贩毒,是有效开展禁毒斗争的重要方针

陕甘宁边区政府开展了全面的禁毒斗争,对各种毒品犯罪活动都进行打击。同时,又把禁毒斗争的重点放在严惩毒贩、堵源截流上。“在种、贩、售、吸四种毒品犯罪的处理上,对吸食者处罚较轻,这是考虑到吸毒者是被动受害人,且当地吸毒现象原本十分盛行,人数众多,如果采取断然措施严厉禁吸,不仅欲速不达,也可能会引起许多人的不满,因此只宜采用限期渐禁的方法。另一方面,对从事毒品贩卖者则给予严厉打击,因为他们是为牟取暴利而造成毒品泛滥的直接祸首。”<sup>②</sup>禁毒要取得成效,就必须切断毒源。陕甘宁边区政府一再申明,对那些为了获取暴利的非法种植、非法贩运、非法出售毒品者,必须坚决取缔:对伤人害理的毒品贩子,必须严厉打击,决不能姑息迁就。严厉打击毒品犯罪,堵塞和杜绝毒品的流入和蔓延,是预防和禁止毒品的重要措施和重要方针。

#### 5 禁毒要与清除其他社会病害配合进行,是有效开展禁毒斗争的综合措施

陕甘宁边区政府把禁毒看作是一个系统工程,从边区的具体情况出发,成功地把禁毒与改造二流子结合起来。刘生海由吸食烟毒的二流子变成闻名的劳动英雄是最为典型的事例。三边分区盐池县的刘生海,被国民党驻军诱惑吸毒,一份家业很快耗尽,穷到没裤子穿,老婆也要离婚,在政府和全村人的劝告下,下决心戒毒,白天烟瘾发作时就到田里做工,夜里烟瘾起时又到田里背柴,终于把烟瘾戒掉了。他勤奋劳作,很快致富,买了6头驴,1头骡,2头牛,种了28垧地,和别人合养81只羊,成了边区著名的劳动英雄。<sup>③</sup>他参加了边区历史上第一次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宴请,获得奖金2万元及有毛泽东、朱德、贺龙、林伯渠、李鼎铭等高级领导人亲笔题词的奖状。<sup>④</sup>

### 三 匪患及其治理

#### (一)边区土匪问题的由来和匪患概况

陕甘宁边区地处西北黄土高原,山峦连绵,沟壑纵横。降雨量稀少,灾荒十分频繁。加之交通不便,地瘠民贫,民风剽悍。<sup>⑤</sup>自古以来就是所谓“盗匪出没”之地。民国以降,更由于封建军阀的野蛮掠夺,反动政府的横征暴敛,土豪劣绅的残酷剥削,致使这里匪患猖獗,成了“土匪的世界”。贫穷落后和饥饿是滋生土匪的沃土。在20—30年代,陕甘两省交界处的黄土高原的腹部是土匪出没的地方。单陕西一省,土匪人数就已愈几万。<sup>⑥</sup>经常剽掠于陕甘乡村的大股土匪有陕北的樊钟秀(绰号樊老二)、永寿的胡海山、华池的陶玉山(绰号陶老二)、庆阳的傅明玉、谭世麟、陈士璋、合水的李培霄,还有来历不明的“高瓜客”“吕毛子”等股匪。“司令庄庄有,副官满院走,官长多如狗”成为这种情形的真实写照。<sup>⑦</sup>土匪给乡村百姓和社会稳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日益肆虐的匪患,连同连绵不断的灾荒、战乱使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生一片凋敝。

① 湘潮:《边区禁烟运动的成绩》《新华日报》1938年6月3日。

② 蒋秋明、朱庆葆著:《中国禁毒历程》,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45—546页。

③ 李智勇著:《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页。

④ 陕西省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政府大事记》,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196—197页。

⑤ 明嘉靖杨经:《固原州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5页。

⑥ 贝思飞、徐有威著:《民国时期的土匪》,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7页。

⑦ 《华池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8页。

这种惨况,直到中共中央率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建立革命政权以后,才有了较大的改观。抗战前,经过1936年的土改和对各地土匪的军事清剿,边区原有的土匪基本上被消灭了。匪患的消除,民生的改善,使边区人民初享安居乐业的生活。但自从抗战发动,八路军开赴前线后,日本帝国主义有计划地收买、勾结、组织和利用边区以外的土匪,进行各种扰乱活动,进攻边区政府。他们四处窜扰,奸淫抢杀,无恶不作。在边区的某些地方形成了猖獗一时的匪患。陕甘宁边区的土匪问题由此产生。此后,随着抗战局势的演变,边区匪患也不断发展变化。整个抗战时期边区匪祸可分成三个阶段<sup>①</sup>。

第一阶段,全面抗战爆发到1938年冬。这一时期,边区23县境内,共有土匪40余股,计4000余人,2000多支枪。<sup>②</sup>这些土匪大多或明或暗地受日寇指使,从事破坏边区的活动。他们除了一般地打家劫舍,杀人掳掠外,还枪杀抗日军人家属、退伍军人、爱国志士、政府工作人员,并破坏国防交通,宣传日本王道当汉奸。其中,李清武股匪在劳山截击周恩来的汽车,酿成劳山事件。陈猴子匪众在黄河边,妄想“打通山西路线”,迎接日寇的到来。<sup>③</sup>他们实际上是日寇的内应。

第二阶段,从1939年冬到1942年初。这段时间正是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制造两次反共摩擦达到高潮的时期,也是边区经济最为困难的时候。前一阶段基本被肃清的土匪又在各地卷土重来,兴风作浪。他们到处烧杀抢掠,祸害人民,并把推翻各地民主政权作为主要目标。有的被国民党中央军收买、唆使,窜进边区境内进行袭扰、破坏。有的则受边区境内国民党县长和保安队支持、庇护,为非作歹,寻衅闹事,其中有些就是保安队“哗变”为匪的。这些土匪的抢劫烧杀,实际上已经成为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事件,侵吞边区的重要方式之一,是一种变相的武装进攻。

第三阶段,从1942年9月到1943年1月。1942年9月,当各地匪患渐次减少时,在边区东北部沿黄河的清涧、绥德、米脂一带,却接连出现了匪情。4个月中股匪作乱40余起。他们专以抢劫、捣毁公营商店、合作社,袭击区乡政府机关,刺杀军人、地方干部,抢夺枪支为主要目的。

综观边区匪患概况,可以发现,当时的匪情错综复杂。从匪徒的构成上看,多为不参加生产的流氓,生活上无法解决的普通群众,还有少数的革命叛徒(逃兵),以及哥老会中最落后的分子。<sup>④</sup>以他们的活动方式来区分,又可分为一般抢劫性的土匪(散匪),如陈老大、刘子清之流和有政治背景、政治企图的惯匪、股匪,像陇东的赵老五、三边的张廷芝等。<sup>⑤</sup>其中尤以后者凶残活跃,危害性大。他们是边区清匪斗争需要着力打击的对象。

## (二)边区解决土匪问题的策略与措施

中共中央及边区政府高度重视土匪问题的解决。因为它是关系到后方的巩固,关系到边区抗日民主模范区的地位,关系到抗战中流砥柱能否保住的问题。为此,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肃清根据地内部的土匪,采用慎重而有效的办法改造那些土匪式的抗日部队。<sup>⑥</sup>在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边区政府针对实际,领导军民制定、采取了一系列标本兼治的清匪策略与措施。

### 1. 大力提高干部政治文化素质,力求消除、减少各种工作失误

边区地瘠民贫,文化教育落后,封建迷信盛行。当地干部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远远不能适应抗战和边区建设的需要。据统计,安塞县区一级干部,文盲的比例为:区委书记为41.3%、区长为

① 肖劲光著:《肖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11页。

② 肖劲光著:《肖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11页。

③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2291页。

④ 《新中华报》1937年5月13日。

⑤ 肖劲光著:《肖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10页。

⑥ 《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03页。

57.11%、自卫军营长为85.17%、妇联主任为100%、工会主任为67.11%、保安助理员和青救会主任均为28.16%。<sup>①</sup>如此低下的文化素质,大大影响了党及政府各项政策方针的贯彻执行。由此造成的工作失误,酿成的匪乱及各种事件并不少见。为了尽快提高边区干部的政治文化素质和参政执政水平,边区政府制定了《陕甘宁边区在职干部教育实施办法》,先后创办了西北党校、边区行政学院、延安大学,分期分批地培训教育干部。同时号召广大干部积极响应中央“关于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整个边区由此掀起了干部学习的热潮。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边区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整体素质有了较大提高,文化、理论及政策水平明显进步,工作能力显著增强,有力地推动了边区抗日民主模范区的建设和清匪工作的展开。

## 2 扶贫济困,做好安置、救济移难民和灾民的工作

土匪属于流民阶层。历史上,由于战乱、灾荒、统治者的横征暴敛,致使农民破产,大量农民被迫游离于乡土结构之外形成了特殊的群体——流民。大多数情形下,他们又是移难民或灾民。他们中的少数人为生活所迫,铤而走险便会成为专靠掠夺社会为生的土匪。抗战爆发不久,从山东、绥远以及冀、晋、豫各省流入边区的难民,总数就达3万以上。<sup>②</sup>据估计整个抗战时期,边区的移难民人数约在10万~15万人,占边区总人口的5%~10%以上。<sup>③</sup>数量如此巨大的移难民,加上边区每年数万的灾民,的确是摆在边区政府面前急需解决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为此,边区政府通过各种方式,采取各种措施,尽力对他们进行安置救济,努力不使他们陷入饥饿死亡,或沦为盗匪。

(1)组织生产自救。边区政府先后颁布了《陕甘宁边区优待难民和贫民的决定》《陕甘宁边区优待移民难民垦荒条例》《优待难民办法》等法律法规,并划定延安、甘泉、麟县、志丹、靖边、华池、曲子等7县为开垦区,帮助鼓励移难民开展垦荒自救。与此同时,边区政府想方设法筹集资金开办了毛纺厂、硝皮厂、农具厂和制药厂等难民工厂用以安置灾难民

(2)开展赈济。从1939年到1942年的4年中,边区政府发放救济粮共722714石,发放救济款合计80974618元。<sup>④</sup>此外,边区政府还通过以工代赈、减免税收等途径来减轻灾难民的负担。边区政府扶贫济困,安置移难民、灾民的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1941年安置移难民7800多户,2万人;1942年又安置5000多户,1.12万多人。<sup>⑤</sup>告别了贫穷饥饿,移难民们不再流离失所。他们的安居乐业,为边区社会秩序的稳定创造了有利条件,流民这一匪源自然也被截断了。

## 3 加强群众的组织、宣传和教育,改造社会不良现象

随着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边区民众大多数都参加了群众团体。各业工人95%加入了工会,农民全体加入了农会,妇女70%以上加入了妇女救国会,青年绝大多数加入了青年救国会。商人也组织了商会。这些群众组织和团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边区旧有的社会组织结构,有效制止和消灭了反动秘密社团和地方民团这些黑势力集团的活动。广泛建立起的民众团体为边区政府宣传教育群众,动员群众参加社会改造,实现抗战,建设抗日民主模范区,提供了组织保证。

## 4 积极开展武装剿匪

边区的武装剿匪大致以1939年为界分成两大阶段,此前以肃清边区内部的土匪为主,此后以活动于边区境内的政治土匪为主要清剿对象。从1937年10月到1943年1月,八路军留守兵团与边区保安队联合行动,在边区群众的积极配合下,集中力量进行了几次剿匪战役。1937年9月,边

① 宋金寿著:《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647页。

②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27页。

③ 孙艳魁著:《苦难的人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5页。

④ 宋金寿著:《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406页。

⑤ 王寅城著:《陕甘宁边区》,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第36页。

区独立师和蒙汉骑兵团对志丹县内的王子元、李天才等股匪进行了围剿,击毙十余名,俘获百余人,其余溃散,逃离边区。接着,警一团、二团和三团,以及两个独立营和蒙汉骑兵支队,共2000余人,在三边、安定地区先后三次打击股匪张廷芝、范玉山、薛子茂,击毙百余人,缴获马100多匹,枪60支。1938年2月,八路军留守部队又对黄龙山区的股匪发动进攻,将其大部消灭,散匪一部逃入国统区。截止1938年底,边区军民共剿灭40多股大小土匪,毙伤土匪800人左右,俘虏400人左右,缴获枪支1000多支。边区内部的土匪基本被肃清了。<sup>①</sup>经过一年短暂的停息,1939年冬季起,边区匪祸又兴。八路军留守部队和边区保安队再次掀起剿匪高潮,重点打击了几个带有政治背景、罪大恶极的土匪团伙,如赵老五、张廷芝匪帮。1941年2月,边区驻军集中了两个营的兵力在宁夏甜水堡、河连弯一带经过半个月的战斗,全歼了赵老五匪帮。赵老五负伤逃出了边区。<sup>②</sup>经过两年的清剿,第二阶段的剿匪至1942年底圆满结束。共消灭土匪40多股,俘获了900多人,缴获枪1700余支,子弹7万余发,轻机枪10挺,六〇炮、迫击炮两门,马100余匹。<sup>③</sup>在剿匪中,边区军民采取了“军政结合,剿抚兼施”的正确方针、政策,把军事清剿与政治瓦解有机结合起来,政治上争取不放弃,武力上进剿不放松。<sup>④</sup>既重视消灭土匪武装,又注意采取政治攻势,瓦解与分化匪帮内部,在群众中揭露其阴谋罪行。对待被俘的土匪处理得当,部分土匪弃恶从良,持械投诚。

经过边区军民的齐心协力,共同努力,到1943年1月,边区的土匪已全部被肃清,取得了清匪斗争的伟大胜利。边区土匪问题的成功解决,充分证明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不愧为全国抗日民主的模范区,也为解放战争时期及建国初期全国各地的清匪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

## 四 边区的二流子问题与改造二流子

### (一)边区的二流子问题及其危害

边区的二流子问题是边区的另一个主要社会问题。所谓二流子是指陕北农村对那些无正当职业而靠不良行为如窃、赌博、阴阳、巫神、土娼等为谋生手段的人的统称,即那些“不务正业、游手好闲,沿门乞讨,抽大烟,耍赌博,当巫神”之类的人。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乃至边区政府成立时期,陕北和附近地区的二流子人数颇众,据哈里森·福尔曼《北行漫记》估计约有7万多人。而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对陕西省随时可能加入二流子行列的流民估计则达40万人。据当时的调查,1937年前延安市人口不到3000有二流子500,占人口总数的16%。延安县人口约3万,有二流子1692人,占总数的5.6%。陕甘宁边区140万人口中,二流子大约占7.8万。<sup>⑤</sup>

大量游手好闲、不事生产者存在,对正常的社会秩序必然形成极大干扰,从政治、财政、军事和社会秩序、社会风气来说,也是一种不稳定因素。首先,每年对生活无着者的救济无底洞般,对脆弱的边区财政是一种不堪负荷的重担。其次,二流子的恶劣习惯,他们的懒惰、赌博、诈骗、说谎和偷盗,是败坏风气的原因,也是对边区乡村社会生活和秩序规范的挑战。再次,少数生活无着的二流子沦为汉奸、特务、土匪、兵痞或与之相混杂,对边区军事安全造成隐患。对其不进行彻底的改造,边区的经济建设与军事斗争,就不可能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 (二)边区政府改造二流子的主要措施

①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510—511页。

② 肖劲光著:《肖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17页。

③ 宋金寿著:《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343页。

④ 《新中华报》1937年5月26日。

⑤ 《边区二流子的改造》《解放日报》1944年5月1日。

对二流子的改造运动从边区政府成立时开始,最初只是边区社会改造和社会教育的一部分。形成有声势的运动而且达到高潮,是在大生产运动中,余波则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后。它既是边区社会教育的重要内容,又是大生产运动的重要环节,是中共在边区社会动员的彻底贯彻。

### 1 通过社会教育改造二流子

改造二流子运动是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的重要内容。在边区的社会改造中,除了减租减息和建立乡村民主政权,还发动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社会教育运动。这场社会教育运动以扫盲教育和政治教育为核心,其目标是:“1. 消灭文盲,提高大众政治文化水平。2. 提高大众民族觉悟,动员群众参加抗战。3. 提高大众民族思想,使群众获得运用民主的能力与习惯。4. 增进大众日常生活和战时的知识。”<sup>①</sup>事实上,贫穷、落后、愚昧、迷信正是二流子产生的社会根源。反巫神运动和巫神坦白运动直接针对一些以迷信、诈骗、巫神等为业的二流子,是一种治标,而扫盲、加强科学文化知识和医药卫生知识的教育,则在某种程度上是从源头进行阻断。虽然这场社会教育运动中,一则因为边区民众承担了生产、抗敌和支战的重负,一则因为文化教育本身就是长年累月的慢功,非一夕可以奏效,扫盲的目标并未实现,但改造二流子却取得了良好成效。

### 2 通过劳动生产改造二流子

抗战时期,中共组织和军队队伍的迅猛发展,日寇的进逼,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得本来就贫瘠的边区基本物质供给成为存亡攸关、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以南泥湾的成功实践为开端,中共在延安机关、学校和边区农村发动了一场全民参与的声势浩大的大生产运动。

对数量众多的二流子地改造运动是从1939年延安县和华池县率先发起,1942年边区政府也发起二流子改造运动以配合大生产运动。《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改造二流子》积极推广延安县改造二流子的经验,强调“在生产中,不许有一个败家子、一个二流子”。“不许再有一个二流子,不让再有一个劳动力站在生产圈外”。这样,改造二流子就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从边区各县到各乡村,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

边区配合大生产运动改造二流子的方式是:首先,经过群众评议划定二流子。边区严格划分二流子的标准,认定那些完全无正当职业而靠不良行为如盗窃、偷汉、招赌、贩卖违禁物品、拐骗、做巫婆神汉、汉奸等为谋生手段者为二流子;有正当职业又兼不良行为为生活手段者为半二流子;完全靠正当职业为生活手段,但染有不良嗜好或不良习惯者不算二流子。对认定为二流子的,身上挂上白布条标牌。然后由区乡干部对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二流子实行分片包干,负责帮助改造。同时发动全社会监督,一方面对他们进行救济、安置,另一方面给他们分配土地,帮助、鼓励、监督他们参加大生产,或把他们编入各种互助合作组织如合作社、农场、工厂、变工队等。“所有二流子都要改造,参加生产,变成新人”。<sup>②</sup>对顽固不化的二流子,采取的是集中管制、强迫劳动的办法,进行有组织的收容改造,比如绥德市二流子戒烟所。

同时,充分利用了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如戏剧、秧歌等进行动员。戏剧是社教的最好工具,不论抗战动员、改良社会风俗、提倡教育它都是有利的宣传武器。把社会动员中具有代表性的实例改编为戏剧和秧歌在乡村巡回演出。例如反映大生产运动的剧目有《订生产计划》《合作社人员》《兄妹开荒》《王麻子变工》《夫妻开荒》等,反映二流子改造的剧目就有《二流子转变》《李财东》《动员起来》等。它与报纸的宣传、民众的监督一起,形成强大的心理和舆论攻势,有力促进了二流子的改造。

① 《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2页。

### (三)改造二流子运动的成就与启示

首先,改造了社会上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二流子”。通过劳动教育,这些人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甚至成为劳动模范。例如曾经做了十年二流子的申长林,在大生产运动中就成为三个农民典型之一,另一个曾经是闻名边区的二流子刘生海也改造成为边区著名的劳动英雄。刘生海在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说:“想不到曾是‘二流子’的我,也会有今天,我要报答政府这样好地对待我,以后更要好好劳动。”<sup>①</sup>《解放日报》对他们的事迹进行了宣传。边区1943年改造二流子4500多人<sup>②</sup>,剩下的二流子经过1944年和1945年的改造,也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其中最成功的是延安县,1943年改造二流子1629人,该县二流子已所剩无几。

第二,为大生产运动提供了大量急需的劳动力。边区有大量可耕荒地,而劳动力严重不足,边区政府“发动民众组织劳动互助社,以调剂劳动力。动员妇女、儿童参加生产,以增加生产力,奖励劳动英雄,以提高群众劳动热忱”。<sup>③</sup>二流子改造运动使数千计的劳动力不再需要边区政府救济,而且投入了物质财富的生产创造,这就大大减轻了边区政府的财政负担。

第三,促进了社会风气的转变,稳定了社会秩序,进一步堵塞了汉奸特务利用二流子进行破坏的漏洞。二流子大部分都改造成健康勤劳的农民,“好吃懒做被看做是耻辱”<sup>④</sup>,“从前乞丐到处可见,现在早已绝迹了”。<sup>⑤</sup>边区成了无妓女、无乞丐、无小偷的文明社会。访问延安的黄炎培先生和许多外国记者都盛赞边区的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的良好,与国统区形成鲜明对照。毛泽东评价二流子改造运动“是布尔什维克的好经验,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不但增加了劳动力,而且消灭了坏人坏事,取得了人民的拥护,巩固了社会的安宁”。<sup>⑥</sup>

二流子的改造对陕甘宁边区的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的改造、社会风尚的变迁,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同时,它通过对落后分子的改造,甚至将之培养为新式的地方精英,并由此发动群众,从而将权力的触角深入到乡村社会,试图实现对中国社会的根本性改造,因此,它实际上还是中共政治权威在乡村确立的过程。从革命时期的乡村社会政治动员来说,它是极其成功的。撇开二流子改造运动的革命和战争环境因素,从树立中共基层组织政治权威和巩固基层政权的角度,二流子改造运动今天仍然有着值得借鉴的历史价值。在今天乡村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市场经济时代基层政权和基层党组织经济资源的占有和控制力严重削弱,乡村利益主体多样化,另一方面,村民自治存在着种种不完善,导致在某种程度上,中共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面临着权威受到削弱的问题。除了宗法家族势力、变相宗教组织外,地痞、恶霸等流氓恶势力在乡村中的影响力开始抬头。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对待这些不良势力,以整合乡村各种力量,增强基层政权和基层党组织的权威和影响力乃至控制力,二流子的改造运动是值得反思和参照的。

(作者雷甲平,延安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李仲明)

① 《刘生海从二流子变成劳动模范》,《解放日报》1944年1月1日。

② 李维汉著:《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13页。

③ 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5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28页。

④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268页。

⑤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624页。

⑥ 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5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30页。